

业勤纱厂厂房



春来发几枝

——近代锡商投资兴业的几则剪影

陆 阳

(无锡市惠山区人大常委会,江苏无锡,214174)

1896年,无锡以近代机器为动力生产且按市场价值取向的近代工业蹒跚起步,一个以实业为立身之本的被称为“锡商”的商人群体也由此横空出世。

无锡近代工业迅速发展,呈现出一派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繁荣景象。至1912年,无锡民族工业已经有了20家企业,纺织、缫丝、面粉加工三大工业主体已经确立,无锡在迈向近代化的进程中跨出了率先的一步。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,使帝国主义一度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,给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带来了难得契机。无锡民族工业界审时度势,抓住机遇竭力拓展。到20世纪20年代末,企业数从20个猛增至172个,生产能力得到大幅度增长。当时,无锡已经形成了荣家、薛家、杨家、周家和唐蔡、唐程六大资本集团。到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1929年,六大集团工业资本总额达到了998.1万元;12个工业系统,208家工厂,工业资产总额为1177多万元,营业总额达9877多万元,从业工人达7万余人,位居全国前列。1939年,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编制《无锡工业实际情况的调查报告》,引用了1937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相关资料:抗战爆发前夕,无锡工厂数315家,仅次于上海、天津、广州和武汉,居全国第五;工业投资总额为1407万元,居全国第五;工业生产总值7726万元,居全国第一;就业工人数仅次于上海,位居全国第二;在非条约通商口岸城市中,无锡的轻工业发达程度居全国第一。在上海、广州、武汉、天津、青岛、无锡“工商业六强”的城市中,只有无锡的身份是一个县。

站在今天的角度,回顾那一段风云激荡的历史,其间有许多人物和故事,值得今天的人们缅怀和牢记。

业勤:无锡民族工业“第一家”

1896年冬季的一天,在锡城东门外运河边的兴隆

桥畔,一大片粉墙黛瓦的江南民房之中,矗立起一幢16开间的西式二层楼房。一种从未有过的轰鸣声,让附近居民们感到十分惊奇。一家名叫业勤纱厂的近代工厂,由此走进人们的视野。

业勤纱厂是无锡地区第一家近代机器工厂,也是江苏省最早的民族企业之一。由此,无锡坐稳了民族工商业发祥地的地位。

纱厂的创办人,是一对杨姓兄弟。兄长叫杨宗濂,字艺芳,生于1832年;弟弟杨宗瀚,字藕芳,生于1839年。两人在五兄弟中分别排行老大、老三。

1862年,李鸿章率领淮军东下上海后,杨氏兄弟即应聘入幕。杨宗濂长期在天津总办武备学堂,一度也兼督办顺直纺织事务。杨宗瀚则在刘铭传督理台湾军务并任台湾巡抚时,被委任协办商务、洋务,兼办开埠事宜,还参与过台湾南北铁路的兴建。1891年,李鸿章召杨宗瀚接办上海织布局。在这期间,他全面整顿局务,不到一年时间就使这家筹办十年一直陷于困境的工厂开工投产。

几年后,杨氏兄弟相继辞官回到家乡无锡。由于他俩已有在外兴办工厂的经验,遂决定利用无锡农村物产和人力资源,开办一家纺织厂。兄弟俩将厂名叫“业勤”,就是取古训“业精于勤荒于嬉”之意。在《锡山业勤机器纺纱公厂章程》中,杨氏兄弟这样写道:“窃自通商以来,洋货行销日广,洋药而外,以纱布为大宗……彼族之侵我利权,占我生计者,似亦莫甚于纺织、缫丝诸大端,不待智者而知矣。吾侪共同体艰,权衡本末,仍当从纺织入手,果有余力,再图推广缫丝。爰思常州府属女工,勤于纺织,购用洋纱为数甚巨。锡邑当苏常孔道,邻境多产花之区,招工尤便,自应先开风气,以阜财源……兹已勘定无锡县东门外兴隆桥水陆便利之区,克期营造,置设纱机,名曰锡山业勤机器纺纱公厂。俟有成效,

再行扩充。”^[1]

纱厂置地建房于东门外兴隆桥,厂基约占地40亩。1895年,厂房开始动工,翌年建成,为西洋式砖木结构二层大楼。纺机设备系从英国进口,同年运抵,计有细纱28台,共10192枚纱锭,并配套清花、梳棉、棉条、粗纱、摇纱等设备。动力方面有兰开夏式锅炉三台,建锅炉间配350马力双缸蒸汽机两台,并有直流发电机一台。另配有少量车床和刨床的修理工场和轧棉工场。

不过,新式工厂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完全是一件新生事物。原定的股金迟迟收取不足,杨氏兄弟股金未及半数,外股则普遍持观望态度,致使机价花本无以偿付,洋商追逼。不得已之下,杨宗瀚只得急赴南京,求助于湘幕之旧交、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,借到江苏省库的积谷公款10万两,再招存款4万两(部分系北洋派官僚的私款),再由杨宗瀚变卖了部分田产和妻女首饰,拼凑到2万两。这16万两,解了燃眉之急。

1896年底,业勤纱厂正式开工生产,由杨宗瀚为总办,主持厂务。业勤当时设备在国内纺织企业中已属先进。工厂向无锡四乡招工1100人,以产14支纱为主,日夜出纱8000余磅,年产纱约7500件,商标为“四海升平”,大部销往苏南农村,供广大农民纺织土布之用。该厂由于机器生产,质量、产量均高于土法生产,销路广甚至供不应求,因此获利甚丰。据《北华捷报》报道:“该厂虽然昼夜开工,对于常州府和苏州府的各个乡镇对该厂的需要,尚无法全部供应。……这个纱厂的盛况是少有的,在富有效率的经营之下,该厂股息最少将为25%。”^[2]该厂开办后第二年即盈余4.8万两,第三年盈利又有增长。

自1903年起,业勤在三年中连续增添纱锭,使全厂纱锭达到13832枚,产品也增加了12支纱和16支纱,男女工人增至1400人,全厂日夜产纱一万余磅,进入了最为昌盛之期。在连年获利的基础上,到1906年已盈利50余万两,高出原有资本一倍。除偿清所借的积谷款和债务外,还发了对本对利的大财。

荣家:发轫于一次意外的耽误

在如今的无锡西水墩上,有着一座名为“中国民族工商业博物馆”的建筑。红砖的外墙被重新装修、加固,厂区内再也听不到轰鸣的机器声,只有被刷新过的四壁,默存着一段曾经红火的历史。这就是当年的茂新面粉厂,原名保兴面粉厂,是1902年荣宗敬、荣德生兄弟创办的企业。

1896年,也就是业勤纱厂建成投产的那一年,无锡市的钱庄行业正是红火的时候。家住无锡荣巷的荣熙泰,看准了钱庄蕴含的巨大商机,决定支持两个儿子——荣宗敬、荣德生,到经济更繁荣的上海开一家钱庄。这年2月,兄弟俩来到上海,与别人合伙开办了广生钱庄。两三年后,广生钱庄在竞争激烈的上海滩开始站稳脚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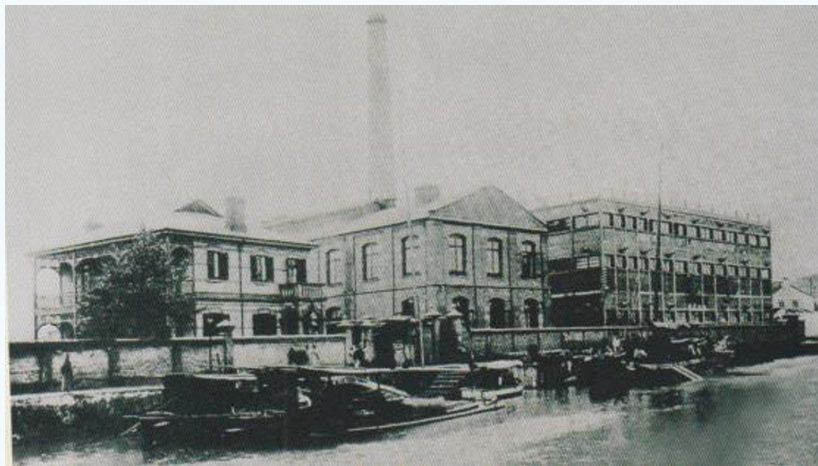
1900年,八国联军入侵华北,北方发生粮荒,江南的粮食大批北运。8月,荣德生要从广东返回家乡无锡。当时,广州与北方之间的交通多走水路,从香港乘船至上海,再转道无锡。可是,受北方战事影响,北上的航船稀少,荣德生在香港滞留了5天,每天去尖沙咀码头询问船期。码头上一片雪白,这是外国公司在尖沙咀向中国内地大量转运面粉时落下的粉屑。荣德生的胸襟顿然大开:投身实业,创办面粉厂,解决民生之需,不但于国于民有益,而且可赚大钱!

当他把这一想法告诉荣宗敬时,兄弟俩一拍即合。第二年农历二月初八,荣德生挑了这一良辰吉日破土动工。工厂取名保兴,有“保证兴旺”的意思。然而,这家新生工厂的开局并不顺利。地方乡绅以工厂烟囱破坏“风水”为由大加阻挠,一纸诉状告到了县衙。这场官司延宕了大半年时间,引得两江总督刘坤一7次过问此案,并狠下批语,才迫使双方和解。工厂投产后,市井上又传言机器生产的面粉有毒。一时间,保兴的面粉销售不动,只能大量积压在仓库里。兄弟俩只得派人走访无锡街巷的面馆、面店、点心铺,向这些面粉大户许诺:先试用,后付款,不满意,不收钱。终于,一部分店家开始接受机制面粉,流言蜚语也就不攻自破,本地市场销路大开,工厂起死回生。

保兴年底盘点账目,收支相抵,几无分红。身为最大股东的合伙人拆股撤出,面粉厂面临散伙之险。兄弟俩思前想后,向外招股,增加了新的股东,同时咬紧牙关筹资增股,成为最大的股东,并将面粉厂更名为“茂新”。

茂新面粉厂是无锡历史上第二家近代企业。17亩地皮,4部法国石磨,3道麦筛,2道粉筛,这是面粉厂的所有家当。虽然设备简陋产量不高,但这个小平的诞生标志着荣氏兄弟投身近代工业的开始,奠定了荣氏兄弟“工商巨子”地位的基础。

1905年,荣氏兄弟又与一帮来自上海、无锡的商人,在茂新面粉厂旁兴建振新纱厂。7位股东,各出3万两,其余招股,实际集资27.08万两。1907年2月,振新纱厂开工投产,有英制纱锭10192枚,每日出纱22—23件。后来,振新纱厂股东因经营方针发生矛盾,荣氏兄



振新纱厂

弟撤股退出。但对于创办振新纱厂的决定,兄弟俩在许多年后仍然感触深切,不能忘怀。1930年,荣宗敬回忆:“余年未弱冠,即习商贾之事,往来申锡间,见夫生齿日繁一日,舶来品日盛一日,不禁兴起创办实业思想”。^[3]荣德生更言:“迨清末叶,五洲棣通,外机制棉纱纷纷运入我国,至国内固有之手工纺织业淘汰殆尽,宗铨鉴于利权外溢,民生凋敝,苟不急起直追,势将侵略无余,爰于让清光绪三十一年集股创办振新纱厂,藉资抵制于万一。”^[4]

薛家:华美的“转身”

说起中国近代史,无锡籍的薛福成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。他是中国近代最早“睁眼看世界”的先驱人物之一。

薛福成早年入洋务派领袖曾国藩的幕府,受到曾国藩的器重。薛福成写下《上曾侯万言书》,以睿智的眼光观察世界大势,剖析国运危局,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改革主张。后来,薛福成又加入李鸿章幕府,成为李的智囊人物。晚年的薛福成还出任清廷驻英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比利时四国公使。在长达数十年的宦宦生涯中,薛福成充分认识到“振兴商务”对于振兴国运的重要性。他极力倡导“以工商为先,耕战植其基,工商扩其用”的思想,主张首先发展工商业,改善茶丝生产,提倡成立股份公司,鼓励民间商贸活动,“夺外利以富吾民”;还进一步提出“导民生财”“为民理财”“殖财养民”“藏富于民”等一系列富民强国主张。

1894年,薛福成逝世。其子薛南溟毅然放弃仕途,转向开拓实业,开始实践父亲的系列工商思想。1896年,薛南溟与周舜卿合资在上海开办永泰丝厂并任经理。有资料表明,永泰丝厂是上海创办的第13

家机器缫丝厂。初创时的永泰丝厂有意大利坐式缫车312台,职工300余人,以后陆续增加到丝车532台,是规模较大的华商丝厂。不久,周舜卿退出股份,工厂即由薛氏独资经营。1909年,他还与他人集资创建无锡最早的耀明电灯公司,任副董事长兼协理。翌年又租营无锡锦记丝厂。至1920年代初,已拥有永泰、锦记、隆昌、永盛、永吉五家丝厂,成为无锡丝厂业之首。1921年永泰所产“金双鹿牌”上等丝曾代表中国丝业参加纽约万国博览会,享誉欧美。1926年,薛南溟将永泰丝厂由上海迁到无锡,由其子薛寿萱管理。对于自己舍弃仕途投身商海之举,薛南溟有言:“经营地方实业垂三十年,思欲以西国新法导中国利用之,以蕲福国利民。”

薛寿萱接手永泰丝厂后,没有故步自封,而是锐意创新,追求丝业的“全面刷新”。在他的领导下,永泰丝厂一头向蚕茧原料产地伸展,培育优良蚕种、推广科学养蚕,加之广设茧行,控制原料的供给和质量、价格,实现了对制种、养蚕、缫丝的一条龙管理;一头向更广阔的国内、国际市场拓展,抢占市场份额,提升经营效益。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期间,薛寿萱更是主动出击,摆脱洋行控制,对外开展直接贸易,产品成功地登陆美国本土,并进而将市场直接扩张到欧洲和澳大利亚,这在当时的中国企业界是绝无仅有的传奇故事,实现了其祖父薛福成提出的“夺外利以富吾民”宏愿。

1930年,无锡永泰丝厂薛寿萱联合无锡、上海等地丝厂组成通运生丝股份贸易公司,跳过洋行直接对外出口。这些丝厂可将自己的生丝产品交公司直接运往外国销售,产销直接见面,避开洋行在中间环节的盘剥,还可避开国内同行的恶性竞销,利润可增加三成左右。1931年,永泰丝厂外销的300件生丝,在外汇结算后的纯利润,相较通过洋行销售,竟超过一倍。“成绩卓著,颇为华丝争光不少”^[5]。当然,目光远大的薛寿萱并不满足于此。1932年,薛寿萱亲自去美国调查生丝情况,拜会了纽约丝业巨头,决定在美国直接推销永泰产品。1933年,一家名叫永泰公司的生丝贸易公司在美国纽约成立,资金5万美元。当时美国因为经济危机影响,进口生丝量骤减,但永泰公司对美的生丝出口由每月800包猛增至2000包。与此同时,薛寿萱还派人到英国、法国、澳大利亚等国调查生丝业务,聘定了代理商。

在主动出击、推进生丝直接出口的同时,薛寿萱秉持开放的理念,在国内同行间实施大规模的兼和联

合,攥紧拳头,增强对外竞争力,同时减少不必要的低水平的内耗。1936年1月,在薛寿萱的倡导下,兴业制丝公司在无锡成立,“以采办蚕茧原料,制造并推销所产各种生丝暨副产品为营业宗旨”,“兴业公司拟租赁本邑各小丝厂自行营业,此为其营业大纲”^[6]。当时,无锡共



唐保谦

有50家丝厂,兴业公司成立后,有36家丝厂被归入旗下,或自营,或租赁,基本上把持了无锡的缫丝工业。除了永泰系5个工厂以及其他保持相对独立经营的9个工厂外,薛寿萱将当时一些生丝质量低下的小丝厂租下后全部关闭,而对技术设备条件较好的永昌、民丰、振元、振艺等11个丝厂,由兴业公司开工经营。薛寿萱组织力量对美、欧的300多家客户工厂进行了详细调查,对他们各自需要的生丝等级、规格、数量等逐一建立账卡,实行以销定产,产销见面,从而在生产中对兴业公司作出相应安排,分档次组织生产。1936年终,兴业公司结算红利,共获纯利50万元,为公司联合时实收资本的2倍;加上公司所属各厂的赢利,达到224万元。

此间,薛寿萱的永泰系通过兼并、收购,旗下丝厂扩大到16家之多,全部丝车达6674台,每日产丝85担,生丝总产量占整个无锡丝厂业的60%以上。永泰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、实力最为雄厚的制丝业资本集团,薛寿萱也当之无愧地获得了“丝业大王”的美称。

唐家:市场的“宠儿”

与出身官宦人家的杨、薛氏,以及与出身钱庄业的荣氏兄弟相比,分别创办了九丰面粉厂、庆丰纺织厂和丽新纺织染整厂、协新毛纺厂的唐家,则出身于经营布业的商业世家。在重农抑商的时代,唐家门庭并不显赫,甚至略显低微。

无锡唐家,原是常州府武进人氏,谱称毗陵唐氏。明末清初部分族人避战乱,向南迁移到了无锡东门,到了清末已延至第十六世,其中唐懋勋逐渐成为家族中的佼佼者。唐懋勋善于经营,开设的“唐时长布庄”是当时无锡著名的四大布庄之一。清末,太平天国战乱又起,唐懋勋率领跟其经商的两个儿子迁



唐骧廷

居无锡城东严家桥小镇。

从20世纪初起,无锡的近代工业得到蓬勃发展。唐保谦是唐懋勋众多孙子中的一位,从严家桥走出,来到无锡蓉湖庄,与蔡缄三联合其他商人合资创办了九丰面粉厂。因为工厂由九位股东合资创办,所以工厂取名“九丰”。又因厂址地处惠山和锡山之麓,取山

麓之谐音,以“山鹿”为商标。

1911年初,九丰面粉厂正式投入生产,这是无锡继茂新之后第二家机制面粉厂。此时,东北、华北的市场已经被茂新的兵船面粉占据,山鹿面粉该往哪里发展呢?九丰面粉厂的九位股东大多商人出身,或从事布庄生意,或经营堆栈业务,或是米业巨头,自然熟谙市场经营之道。唐保谦、蔡缄三在无锡商业金融集中地的北塘大街设立管理处,在上海设立申庄,除了批发业务外,还广泛收集上海交易所行情和国际经济情报。为了正确了解市场行情,他们还专门高薪聘请了一位年近花甲的“孙仙人”。此人一无学历文凭,二不懂生产技术,但积累了几十年气候变化和各地农作物丰歉的详细资料,对当年天气趋势和小麦收成的预测,往往八九不离十。唐保谦、蔡缄三对此人颇为倚重,在确定原料购进数量、生产规模、销售去向以及产品定价时,以此作出恰当的判断和决策。

对市场的尊重,使得九丰面粉厂很快就站稳了脚跟,在沪宁线和杭州等地,山鹿面粉销数居于榜首。工厂开办三年,年年盈余,九位股东也因此获得不菲收入,一时民间有了“买了九丰的股票就好比着了头彩”的说法。

到了1921年,唐保谦、蔡缄三再次对外筹资,在周山浜兴办庆丰纺织厂,再获成功。这家纺织厂成为无锡地区七大棉纺织厂之一,唐、蔡资本集团也由此形成。

同样遗传了唐家优秀商业基因的,还有唐保谦的同门兄弟唐骧廷。他从严家桥走出后,与程敬堂一起在北大街办起了九余绸布庄。有了盈利之后,又联合其他商人接盘办起了丽华布厂,接着又办起了无锡地区第一家集织造、漂染、整理于一体的丽新染织厂,在抗战爆发前又办起了著名的协新毛纺织厂,形成了唐、程资本集团。

唐骧廷、程敬堂利用经营绸布庄经验,大力开发和生产市场适销产品。他们规定工厂经营管理人员到上

海、南京等地出差,要特别注意外籍人士和新潮人士的服饰质料、花色,到各地农村办货,也要了解穿着的风俗习惯,留意农民普遍喜欢的色调、花样,做好记录,回厂交技术人员进行设计生产。工厂全盛时期同时投产的品种多达100多种,真正做到了在产品品种上的独树一帜。其中“麦草花”“凤尾花”等印花布,图案清新,价廉物美,深受农民欢迎;鸳鸯府绸、条子漂布、印花麻纱等产品,柔软滑爽,色泽明丽,在两广、香港、南洋等地热销不衰。

周家:“捡”来的“煤铁大王”

说起无锡近代锡商,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——周舜卿。他是上海滩有名的“煤铁大王”,并创下无锡乃至全国数个第一:1903年开办无锡第一所商业职校——廷弼商业学堂,1904年创建无锡第一家机械缫丝厂——裕昌丝厂,1906年首创我国最早的私营商业兼储蓄银行——信成商业储蓄银行。

1867年,年轻的周舜卿来到上海南市,在同乡丁明奎开设的上海利昌煤铁行当学徒。其时,上海初开商埠,随着贸易扩大,已成为我国的最大金融中心。利昌煤铁行经常与外商做生意,周舜卿凭着少年的聪颖,深深感到通晓英语的重要,否则难以洞悉商情,立足于上海商界。因此,他忍饥挨饿,用节约下来的午餐补贴费作学费,白天在利昌煤铁行当学徒,晚上步行20多里,到业余补习班学英语。他狠下苦功,风雨无阻,寒暑不辍,经过几年的努力,他练就一口流利的英语,能够和英人熟练交谈。

机会就这样来了。在一次与大明洋行接洽业务时,周舜卿结识了经营铁业的英国商人、大明洋行的大班帅初。周家后人在《行述》中记载,“有英商帅初者贩铁为业,一见府君(按:周舜卿),即器重之。”^[7]精明能干又通英语,周舜卿被聘入大明洋行任职。

关于周舜卿与英商帅初的相识,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坊间传说。在利昌当上接洽外商的办事员后,有一天,周舜卿在外出收账的路上,捡到了一只皮包,他打开一看,里面竟是一张巨额支票。周舜卿想到的不是自己,而是失主焦急万分的心情。于是,他根据支票上的地点,千方百计地去找失主。这位失主正是帅初。帅初十分感动,不久就把周舜卿调去大明洋行任职。不管这个传说是否真实,但周舜卿的命运从结识帅初的那一刻起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。周舜卿结识帅初,并得到帅初的奥援,其间尽管有着偶然,但更多是必然,取决于年轻周舜卿的勤奋和诚信。

1878年,帅初交给周舜卿5000两银子,让他在上海苏州河畔四川路桥附近,开设升昌五金煤铁号,经营煤和钢铁等器材,并任命他为铁号经理。周舜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,因经营注重信用,不数年业务大振,资力日益雄厚,就陆续在牛庄、汉口、镇江、常州、无锡、苏州及日本长崎等地共开设7家分号,主要业务是为英商怡和洋行代销钢铁器材。周舜卿对货物进出、资金往来都逐笔记账,把每年所获取的利润,悉数存入银行。帅初见周舜卿是把经营的好手,就让他全权打理商号,而周舜卿丝毫没有懈怠,依然做到所有函件、账目都亲自过目过手,年终如数提交老板。后来帅初在英国病故,其子来上海料理遗产,除提取升昌盈余3万两外,其余资财悉数赠予周舜卿。这一年周舜卿30岁,他实现了自己第一桶金,由此走上了独立经营之路。

于是,周舜卿以升昌为发展基础,又在升昌旁开设震昌煤铁行。升昌、震昌名义上是两家,可实际上业务、财务都没有分开。他之所以要增开震昌,完全是交易的需要。后来,他又在温州开设同昌,在无锡开设广昌,在苏州开设升昌。这些带有“昌”字号的铁行,主要经营钢铁等商品。到了1895年前后,他所有商号总资金已在30万以上,年销售额在100万以上。1896年,他转向手工业,独资创办新昌冶坊,自产自销,5年后又兼并上海第一家冶坊源来冶坊,合资10万两成立新源来冶坊,专门生产铁锅,跃居江苏八大冶坊之首。周舜卿也被誉为中国的“煤铁大王”。^⑧

参考文献

- [1]钱江整理:《锡山业勤机器纺纱公厂集股章程》,无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:《无锡文史资料》第30辑,1995年,第40页。
- [2]《北华捷报》1897年5月28日。转引自汪敬虞主编:《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》第二辑下册,第688-689页。
- [3]荣宗敬:《总经理自述》,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文教基金会编:《中国民族工业先驱荣宗敬生平史料选编》,广陵书社,2013年,第25页。
- [4]荣德生:《中新第三纺织厂概略》,《荣德生文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266页。
- [5]高景岳、严学熙编:《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》,江苏人民出版社、江苏古籍出版社,1987年,第82-83页。
- [6]钱耀兴主编:《无锡市丝绸工业志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90年,第418页。
- [7]《周舜卿行述》,王金中、沈仲明主编:《无锡工商先驱周舜卿》,凤凰出版社,2007年,第23页。